

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

2000-2002

上海文艺出版社

获奖作品集

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

获 奖 作 品 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0~2002)获奖作品集:

大奖办公室 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1

ISBN 7-5321-2590-4

I. 第… II. 大…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827 号

责任编辑:邢庆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

(2000~2002)获奖作品集

大奖办公室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568,00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50 册

ISBN 7-5321-2590-4/I·2036 定价:4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742915

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
大奖”(2000—2002)获奖名单

长篇小说

一等奖	《抒情年代》	潘 婧
二等奖	《银城故事》	李 锐
	《富萍》	王安忆
三等奖	《出浴——朔方贝子池传奇》	冯苓植
	《大漠祭》	雪 漠
	《省委书记》	陆天明

中篇小说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奔跑的火光》	方 方
	《狂犬事件》	陈应松
	《七宝楼台》	陈 平
三等奖	《民教小香》	王新军
	《南京在哪里》	吕志青
	《哦,我的可可西里》	杜光辉

目 录

抒情年代	潘 婧[1]
无法命名的年代	
奔跑的火光	方 方[194]
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英芝?	
狂犬事件	陈应松[299]
我是如此地热爱山冈	
七宝楼台	陈 平[357]
我写小说	
民教小香	王新军[421]
创作谈	
南京在哪里	吕志青[469]
学习不断地犯错误	
哦,我的可可西里	杜光辉[510]

拷问人性中的丑恶

银城故事(存目) 李 锐〔627〕

《银城故事》访谈

富萍(存目) 王安忆〔638〕

水色上海

大漠祭(存目) 雪 漠〔642〕

我的文学之悟

出浴——朔方贝子池搜奇(存目) 冯苓植〔648〕

《出浴》杂谈

省委书记(存目) 陆天明〔655〕

我为什么要写《省委书记》

初评、终评会议纪要 〔662〕

出版后记 〔699〕



抒情年代

1 抒情

诗——

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
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

——芒克：《十月的献诗》1973 年

他们的不幸，来自理想的不幸
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

.....

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

——多多：《教诲》1976 年

维明的手记

引 子

尘封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从这片凝固的湖水开始。颜料的色泽已被流逝的时光作旧：在黑蓝色的天空与黑蓝色湖水之间，月光划开一条小路，把记忆引向幽暗的深渊。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关于个人的记忆。

只有书页大小的一幅油画，J 把它连同她的手稿一起寄给我。她问：这幅风景写生是你的？还是 N 的？它夹在那些年代已久的，有待清理的信件之中，丢在被遗弃的角落里。她说在写完《湖》与《小屋》之后，她不想继续保留与此相关的一切文件与资料。在这两篇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章的小说中，她清算并凝固了对于过去的回忆。那里面有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我熟悉的一些人的影子。当那些影子从幽暗的角落里走出来，在记忆与想象的光芒下，他们已不再是原来的容貌，他们具有自己的独立的意志，与他们的原型脱离。对于 J，写作意味着将过去剥离。写作是为了遗忘。J 说，当她能够开口言说的时候，过去已离她而去。

这幅画可能出自 N 的手笔。那时候他喜欢寂寥的夜色。年轻时的 J 与 N，他们都曾经执迷于他们经历中的黑暗的部分，正如 N 某一时期的诗的风格：在喑哑的空旷之中，执拗地走向黑暗的极处。

记忆比灵魂更为复杂。J 说，她因此感到惶惑。对于她所写下的这一切，对于写作本身，她是惶惑的。她不知道记忆是否可靠，她不知道她的记忆在多大的程度上逼近历史的真实，逼近生活乃至生命的本源。

J 的小说之一

湖

初恋是真摯的，也是肤浅的，有时，并不真的是你自己：涓生第一次向子君示爱的时候，慌乱中用了最俗套的方式。初恋的表现形式不是本能的，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在此之前，我们像中学生写作文那样，事先构思了情人的形象。其实，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象与现实的分裂，是初恋必然破灭的根源。有时，这会伤害心灵。诗，就是由伤害和梦想产生的。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诗人。对于我们这些“误生的人”，我们所有的涂抹着悲剧色彩的生命，我们的鲜活的血肉之躯终将化为灰烬，与一代又一代的前人不会有什么区别。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微不足道。最终留给历史的，也许不过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断句。那些在绝望中苦苦吟就的诗篇，真的能够留下来吗？那几位曾经显赫的诗人，他们成名于 70 年代末，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始于 60 年代末或 70 年代初，如今称之为“文革”的年代。一个我们竭力要忘记的时代。那时我 18 岁。在我 18 岁及以后的几年里，我是在一个小小的渔村里度过的。那个被笼罩在绿树中的村庄坐落在华北平原的美丽的湖泊中。我永远记得那里的清晨和黄昏，早霞和晚霞热烈而宁静，像燃烧的冰，把湖水染成点着碎金的景泰蓝；有时阴天，黑云沉重得快要落下来；大雨把整个世界融为辽阔的灰色，水，天，岸和远处的芦苇荡被夺去了色彩。笼罩我们青年时代的是灰色的天空。但是青春不会有真正的绝望。朦胧诗就产生于那个浪漫的湖泊，产生于湖边默默无语的夜晚，天与水融为一片浑厚的空间，像创世记的洪荒；璀璨的星空寂静得令人恐怖。

如诗一般迷惘的湖，湖水一般动荡的诗，还有北京古老的街巷，几百年的胡同里败破的旧房子，这些，是我的失败的初恋的背景，像一个心灵深处的梦，绵延不断，缠绕不清。伤害是难以估量的。为了抵偿痛苦，我固执地保存了一丝浪漫的情愫，谨慎地留给自己；另一方面，以痛快淋漓的恶意，把人生撕碎了看。由此，我对诗，对诗人，对由词语构成的历史产生了怀疑。

有很多年，我不再读诗。目睹了创作的艰辛而枯燥的过程，诗的神秘感消失了。阅读不再是愉悦的。当我读诗的时候，也像读那些阿谀奉承的名人传记一样，总是试图发现在光辉的意境的背后，灵魂的黑暗的背景。诗如同一道梦幻的屏障，遮蔽了诗人所不愿洞见的一切，以免为恐惧所吞噬。这是 N 的特点，他的大部分诗都有这样的倾向。我不喜欢他的诗，我无法容忍一个分裂的人格；在我们一起相处的那几年，他的诗是纤弱的，有一种肤浅的浪漫，而后来，却发展为上天入地，古往今来的壮阔；我知道这嬗变过程中的内在的隐秘。然而，当虚幻的创造与你的生活搅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被欺骗了，这对我的影响真是摧毁性的，你对现世总是不满的，你向往着彼岸，而创造的痛苦和污秽破坏了你的宗教情绪，你无所适从。

有很多年，N 在他的小屋里写诗，所有的痛苦，我们彼此之间残酷的伤害，就发生在小屋里。北京初冬的风沙，颓旧的胡同，昏黄而寒瑟的小屋。然而，最初的事情是从湖边开始的。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的历史就那个湖开始。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历史；没有个性和自由，也就没有历史；也没有隐私，我们写日记，像雷锋那样写，为了拿给别人看；记得在我 15 岁以后，就不再有郊游，不再有夏令营，有忆苦思甜，有阶级教育，除了去迎宾，不再穿花衣服；如果那个干巴巴的世界也能够持续 70 年，我们也将终老于生之混沌，如同上古时代的人，所以在此之前，关于我们个人的历

史是没有的。只有关于童年的片段的记忆。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喜欢写关于童年的往事;写古老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试图保存下来的北京,摆着盆景,爬满葡萄藤的四合院,在炎炎的夏日,老槐树下幽深的胡同;写城墙的颓败之美;暮色中的角楼,成群的蝙蝠静静地翱翔,不祥而忧郁;冬天的郊外,裸露的田野上,栖息着大片的乌鸦,翅膀闪着蓝紫色的光。如今,没有了。都没有了。古老的,与我的童年叠印在一起的北京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斑斓的,高耸的城市。童年被从记忆中粗暴地涂抹。在喧嚣的车流与楼群中,只有故宫的金黄的屋顶,像一抹久远而固执的记忆,在污染的空气中,闪烁着帝制时代古老而辉煌的光芒。然而那是与我们无关的历史。在断裂之中,在湖边,我们开始了我们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在北京,不在这个古老的京城。

在一位诗人的小说里,把我们当年生活过的那片湖泊称为大青湖,有一种荒芜和草莽的意味,相对于已逝的荒蛮的青春岁月,或许比它原来的名字更具真实;它原来的名字使我们想起一种俗套而快活的田园生活,或是如今新开辟的有着粗糙恶俗建筑的旅游区。重新命名是必要的,否则,活生生的命运将消融在陈旧的词语中。

然而我想不出任何称谓,可以概括当年我对它的感受,沉痾在意识深处的记忆逐渐地陌生而新鲜,名称只会使记忆僵死和消亡。那一片青碧的水,在大淀中,连绵与天相接,像海;夜晚,伏在天边的村庄闪出几点灯光,融于漫天灿烂的星斗。经过连年的台田,上游水库的拦截,水位的下降,如今,浑厚雄伟的大淀已不复存在,只有夹在芦苇与荷花之间的狭长的水道,载着游人的机船和水上摩托发出嗡嗡的响声,如同一曲夹杂着摇滚味道的江南小调。

我和珊珊第一次到这里来,是在冬天。我们18岁。县城只有一条街,漫卷着北方的尘沙;副食商店的柜台空空荡荡;在商店的外面,

有农民在卖烤得焦脆的麦芽糖。街的尽头,就是湖的堤岸。淡青色的冰面上,弥漫着一层灰色的薄雾,在寂寞的寒冷中,天空也仿佛凝冻了,在天与冰的遥远的汇合处,是一轮悲壮的红日。穿着一身黑棉衣的渔民划着冰床,迅忽如弦上的箭。我们穿上冰鞋,滑向位于湖心的村庄。划过大淀,划过夹在芦苇地之间的狭长的冰道,刚刚上冻的冰面,有些地方还没有冰床走过,没有划痕,像一块巨大的翡翠,冰薄的地方,走过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危险,疲倦和寒冷使我们心中充满悲怆的自豪。

学生时代如此突兀地结束了,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来不及伤感。伤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后来的伤痕文学不过是可笑的,缺少才气的臆想。我们经历了一个残忍的,血腥的年代,如同古罗马的时代,以暴虐为功勋。如此多的沉重,不是我们的心所能够承受的。我们情愿忘却,或是以粗俗的调侃来化解重负;伤感是不可能的。伤感是后来的事。事过境迁,进入中年,再进入老年。当生活只剩下回忆的时候。

我们匆匆离开了学校,是在冬天,刚刚下过第一场雪。大部分同学正按照指令,等待着去陕北;而我们已决定走自己的路。当时在学校掌管我们命运的似乎是“工宣队”之类;我们瞒天过海,私自去街道派出所转户口;由于没有校方的证明,手续有些不合法;户籍员是一个温厚的中年妇女,她必定也有一个甚至两个将要去农村插队的孩子,禁不住我的恳求,她说:手续可以办。不过你必须再慎重地考虑,户口一旦转出,你就再也不能回北京,再也不能回家了。我说:是的,是的,我知道。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还年轻,不知道生你养你的城市对于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以后,在外地的工厂,我体味到无根的枯萎的状态。即使如此,我仍旧不愿为回城做努力;那一类的努力不是向上的,其过程是卑微的。后来的知青大返城,集体上访,在广场上下跪,

固然令人辛酸可悲,如果不是生存的绝望,长久的困顿,不会如此。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卑微的性质。

那时,我不能预知的,是关于这个时代,这样一个非常的时代,它将持续多久?那时我如此年轻,却如此悲观,对于时代,我似乎只有彻底的绝望。正是绝望的情绪使我与 N 相遇。在他的小屋里,我体味了绝望的真正可怕的一面。但是在此之前,我偏执于一个绝望的结论,这使我对现实获得一种明晰而透彻的眼光。

那一天我不假思索地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学校。提着行李离开宿舍的时候,想到不必再锁门了;心,陡然地空了。在那短短的一刻,我隐约地意识到我主动以及被迫失去的是什么,意识到我将面临的无限的,前所未有的艰辛。踏着积雪,从宿舍楼走向大门,似乎很远。融化的雪水使校园更加斑驳凋零,沿墙停放着自行车,随意而凌乱;再过几天,将不再有自行车,所有的人都将离开校园;一个没有学生的学校,空洞而陌生。在那短暂的一刻,我惊异我的心竟如此的冷硬,这个“文革”前最著名的女校,曾有着最精良的设备,最优秀的教师,最出类拔萃的学生;她曾凝聚着我的少女时代所有的荣誉和梦想,而我,离开了。踩着泥泞,没有回头。

如果说,我热爱这片湖,似乎不真实;我并没有留在这里,也从未想到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像当时的许多激情的插队知青那样。我是城市的孩子,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在我走进村里为我们准备的房子,开始用柴锅烧水的时候,我就明白,我们将离开这里,这是迟早的事情;也可能终老于此,然而,死也是一种离开。但是,那时候,我和珊珊穿过大淀,沿着柳堤,走向湖心的村庄,冰面升腾的雾气凝聚在地面,凝聚在树上,结成厚厚的冰霜,形成罕有的雾凇现象:十里长堤犹如一片白色的珊瑚林。对于我,这冰与霜的琉璃世界是一个童

话,越过了阴霾而残酷的时代,回到少年时期的浪漫情怀。浪漫与幻想是必不可少的,支撑着我们的逆境中的青春。在这里,我生活了五年,正是湖畔的近于虚幻的美景,朦胧地向我昭示着一个彼岸的世界。

我们不去想未来,对于未来我是悲观的,我始终是悲观的,直到现在。这一点,我与珊珊是不同的。我们的出身不同,生长的环境不同,感受世界的方式也不同。对于我,“文革”不是从1966年开始,在此两年前,我已经明白,我的前途不过是一条崎岖的小路,甚或更早,在我对世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怀疑的年龄,我痛苦地感到我将面临一个枯燥而闭锁的世界。从那时起,我对我出生并不得不在此生活的地方产生了厌恶和仇恨;仇恨是显而易见的,爱则是潜在的;我想我是热爱这片土地的,如果离开,我会思念,正如我在北京,常常会梦见那片湖;至于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也许怀恋故乡是人的本性之一,也许因为心必须有一个归宿。在我,“文革”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不可理喻;在此之前,在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调中,我领教了一种堂而皇之的强词夺理,我的稚弱的心已感到隐隐的杀机;二十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那堂而皇之的腔调因循守旧地延续下来,疲惫而陈旧,缺乏信息的刺激。

我想,珊珊与我不同。“文革”之于珊珊,是一次灾变。在此之前,她清纯,高傲,冷漠。“文革”使我们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历,我知道那个时期她所有的挫折,她健康的身心具有柔韧的承受力;在她的纯情的初恋骤然失败后,她的忧伤既哀婉又豪放。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在她那里留下痕迹,犹如岁月没有在她光洁的脸上留下皱纹。多年以后,我偶然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遇见她,她依旧清纯,高傲,冷漠。

看来,经历并不是悲观的本质的原因,悲观的本源是内在的;悲观是本性的,存在于血液之中,得自于遗传。我的父母都是悲观主义者,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由于不幸的际遇而悲观,还是由于悲观而

遭不幸。悲观与不幸在他们身上拧绞在一起,互为因果。

我匆匆地离开北京,离开家,没有回头。年轻的时候,我厌恶我曾生活过的一切地方。厌恶家。在我 16 岁的时候,我已开始厌恶我的家。16 岁,这是一个残忍的年龄,妄自尊大,缺乏同情心,我不可能像男孩子那样去作恶,却在内心深处蔑视我的父母。这使我痛苦不堪。我一生为此痛苦不堪。如今,他们老了,不再有能力折磨我,也不再有能力爱我;而我已是人到中年。面对他们的不幸,我仍旧束手无策,正如我小的时候,在半夜被父母激烈的争吵惊醒,惊恐地望着他们彼此恶语中伤,不知所措;姐姐在另一间屋子里哭,我跑过去,和她一起哭。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的仇恨从何而来;我以为或许夫妻都是如此,家庭都是如此,作为女儿,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苦难。以致后来见到珊珊的父母恩爱情笃,我反而觉得怪异反常。记得曾经读过杰克·伦敦的一个短篇小说,是说一个 16 岁的男孩,由于母亲固执的,不公平的偏爱而最终离开了家,义无反顾,不理睬母亲的哭泣;有一种不可解脱的情感的逻辑,或非逻辑,读来令人心碎。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把故事的主人公换成我自己,想象着我离开家,想象着母亲的哭泣,想象着父亲焦灼的寻找,想象着我对他们的折磨和报复,想得兴奋而心酸。

16 岁时,我希望我是一个孤儿。16 岁,我就想过,将来我决不要结婚,不要丈夫,不要孩子,不要家庭。16 岁,孤独已是我悲壮的誓言。

16 岁到 19 岁,我们经历了一个崩溃的时代。家庭四分五裂,学校解体,过去的权威纷纷倒塌,被打倒在地,肆意践踏;我们的父母被批斗,难得见到他们,不再有人管束我们。历史的灾难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自由。在我们周围,尽有悲哀和残酷的事情,伤害与痛苦在所难免;少年的心,不似概念所认为的那样软弱,嗜血是人类祖先的本

能,文明的毁灭其实轻而易举。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自由。最初的自由就是这样,带着血腥与痛苦,突然而至。

那清波荡漾的湖水,正是我们对自由的幻想。在湖心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大约有几十个像我们这样的北京学生。像我们一样,不肯接受硬性的分配,到指定的地点集体插队。在这些人中,有后来成名的芒克和多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名人也还有一些,不过那时我们互不相识,只是彼此听说过,知道对方的名字。在秋天寒瑟的湖面上,飘过云团一般的雾气;我们的船与他们的船交错而过,倏忽之间,令人心悸的惊险,划船的男孩高高的个子,轮廓分明的漂亮的脸,新鲜刺人的笑容,这或许就是我记忆中的芒克。30年后。在一些零散的回忆文章中,有人形容他的小狼一样的笑容。他们的船迅速地隐入浓雾之中,若隐若现,正如记忆的虚无缥缈。那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流窜”到这里,带着书,带着相似的梦想。在这里,没有兵团的军人或北京来的干部管辖,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曾试图管理我们,但不成功。这使我们有别于在东北、云南以及陕北集体落户的几十万知青。生平第一次,我们脱离了“组织”,没有了档案,没有了单位,没有了城市户口,作为一个“人口”,我只是小队的用于分粮食的集体户口本上的一个数字,我=1,珊珊=1,我+珊珊=2。只要还能吃饱肚子,那么,生平第一次,我们有了自由。

两年前,我与一些朋友一同回到我们从前走过的地方,如今,这片湖已是著名的旅游区。同行的一位卢森堡人惊异于中国农村生活的原始与粗劣,他听说我曾在这里生活了五年,问我:一个长于城市的少女来到如此艰苦的地方,是什么心情?我告诉他,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的悲哀与伤感。无法向来自富庶而自由的西欧人解释清楚二十多年前中国的社会形态,那一段破碎断裂的历史是封闭的,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怪异而模糊,诸如“文革”,插队,知青这一类词

汇已逐渐变得像三脚兽一样,不可理喻。

18岁的时候,我们以青春的蛮勇,贸然走进这片湖。

我们落户的村庄是位于湖心的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岛屿。在它的边缘,有几个更小的岛,如同聚集在母珠周围的小珠。我和珊珊就住在其中的一颗只有几十平米的“小珠”上,一座拱形的木桥连接了小岛和大岛。只有我们一户人家。我们住的房子是50年代的小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早已废弃不用。从门前到水边,大约只有五步的距离。

房间很大。为了防水,内壁没有抹石灰,用白灰勾勒的青砖赤裸着,很像如今酒吧里的仿砖壁纸,但是没有柔和神秘的彩色灯光,没有佳肴美酒,裸露的青砖徒然使得空旷的房间增加了荒野的意味。墙角有一眼砖砌的灶台,村干部要为我们盘土炕,因为怕生虱子,我们拒绝了。取而代之的办法是,从北京托运来床板,吊起了蚊帐,把木衣箱架在床头,当书桌用。我与珊珊连在一起的床铺上,凌乱地堆拥着缎绣的被褥和书籍,在荒芜的大房间里,有如一叶方舟。

被褥是我临行前母亲一针一线缝好的。她为我准备的衣服都很朴素,但不知为什么给了我一床缎绣的被子。金黄色的面子,精致地绣着红白牡丹,富贵的俗气的象征。对于我要去插队,她没有表示异议;父亲和母亲都很清楚,就我们当时的处境而言,别无选择。父亲可能是内疚的,他觉得连累了我们,由于他的莫须有的历史问题,我和妹妹不能留在城里,大学毕业的姐姐不能与她的在军事院校的未婚夫结婚;后来,我们姐妹在工作、婚恋诸多方面都不顺利;小妹有病,本来不能做吃力的工作,学校的工宣队分配她去北大荒,我的父母却不敢表示异议,他们害怕,怕女儿不服从分配会带给他们更多的麻烦。他们被整怕了,莫名其妙的怕,毫无缘由的怕。尤其是我的父亲。实际上,无论怎样恭顺,都将于事无补。但是,似乎除了顺从,他